

2/102

重庆文史资料

第三十一辑

89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3

重庆文史资料

第三十一辑

4.7.175/3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重庆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重 庆 文 史 资 料
第三十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重庆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 北碚)
重庆印制一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6.625

字数: 155 千字

1989年6月第一版 1989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500

ISBN 7-5621-0218-X/K·11

定 价: 2.00 元

目 录

忆惦渠 凌文远(1)

有关建国教育社和新群文化图书公司的一段回忆

..... 吴秋帆(13)

抗战后期重庆的外国记者 沈剑虹(19)

我在侍从室及“总统府”的见闻 朱永堃(28)

重庆“六五”大隧道惨案采访记..... 陈理源(43)

抗战时期迁渝四大纱厂的发展及其贡献

..... 陈昌智(48)

中央印制厂在重庆恢复印钞的前后情况

..... 朱懋提(61)

回忆解放前的重庆西大公司 刘仁耀(65)

补晓岚医师和补一药房 唐世丞(82)

神针万云程..... 张裕纲 万民权(107)

解放前重庆的袍哥 唐绍武 李祝三 蒋相臣(119)

重庆袍哥唐廉江与辛亥革命..... 陈攸序(199)

政协重庆市第九届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

会成员名单 (208)

忆 惦 裴

凌 文 远

宜他每有所思，
宜他每有所言，
果然，得之于苍苍之天，玄玄之野。
通耶？塞耶？每多微言？每多曲笔？
一声也曾两歌，
一手也曾两牍。
噫，竟猎生物于以息相吹之奇！
既以报之以泉，而又泣之以雨。

昔日神乎其技，
惜吾永之见也。
人的价值，仅仅靠生前的种种机遇？
奔马，尘埃，既而也染上庄的积习。
何止无可奉告，
何止无可非议，
一个不懂女人的孩子向他转述——
“爸爸，我相信你有过这段经历”。

深得峨眉雄秀，

颂文山以鼎立。

较之仍然分居海峡两岸的炎黄子孙，

都富于共识，富于正义，富于友谊。

我不忍那样讲，

并曾提醒过你，

——还能见到扉页上的半截子躯体？

大宁河曾借助于他的憨厚吹破牛皮。

往事一如往事，

分离一任分离。

正选了那么一个寸心素裹的观点，

携其家，尾于途，毕其事于京师。

逝者竟如斯乎？

更悲书中有你！

假如，这一切于他都不含半点贬意，

它已铸成大型消费行为的主要动力。

《山路上的铃铛花

——献给一位笔直向犯忌处走去的老人》

这首诗的最后一节，原思有以慰于子芳的。写到这里，于是，又情不自禁地把它附在《电影的锣鼓》卷首的一张插图上，重新看了又看。那大宁河的流水，那大宁河两岸约束流水的山根，那只泊在山根外的五板船，那船头并坐着的一头银发的长者和他那“江津媳妇”。再次读了他在这张照片上的题词，我心都碎了。他，竟从那些人所共知的坎坷岁月的变异中，多所积淀的感愤，用寥寥数十言，却都一泻无遗了；

“本书《电影的锣鼓》一文获罪次年，作者徙流渤海，遗四子一女于吾妻张子芳。伊受辱于莫名，罹难于无期，携家曳尾于途中，窘迫更甚于作者。

“今略志之，并置1986年10月与之同游小三峡时小照一帧于卷首。”

这俨如董小宛在如皋听柳大麻子说大明遗事，似有“游魂好向故人去，莫傍春风怨子规”之异。据我所知，这篇小序，是他夫妇俩去万县归北京，复去柳州途中，取道重庆时所写。于时《电影的锣鼓》一书已开始装订，经他亲去出版社交涉，始临时制版插入的。此时此地，莫非他便有什么预感了么？

去年惦斐夫妇两次从北京来重庆，都是我和碧琴驱车去白市驿机场接的。第一次是回江津参加江津中学的80周年校庆，第二次是经重庆去柳州参加全国影评学会年会。这次留渝，虽仅三天，其中还安排有一个会议，但我们要说的话，也都还是说到了。因事先打过招呼，他是住在重庆市第二招待所的。

临走的那天晚上，不料子芳竟在电话上四处找我。当我和碧琴去向他们告别时，包括适合我吃的药在内，已给收拾了一大包，要我带回。竟象“从天星函到延安”时那样，大家又回到30年代的笑语声中去了。噫！孰料此行，竟成永别。

这些年，见面不多而通联则颇频繁，惦斐所最关心的，作为朋友，是我诗创作的定调问题。他在1983年为我的《乡情集》写过一篇份量重而倍受读者称道的序文，在这篇序文中，曾直言不讳的为我提出：

“我着意的是，文远的诗，要写出自己的风格来。我不

希望他的风格仅在于锤炼，因为锤炼是一般诗人都要做，都可以做，而且只要肯下功夫，也是可以做好的事情。文远的风格在发现自身即他终身从事政治活动，并终身未离乡土，他简直可以说出某一条街，每一幢房子，甚至每一块石头的来历。啊呀呀，凭这一点，也不是当今许多诗人都能具有的！”

惦斐还举例说：我熟悉小川甚于文远，而在我看来，小川的诗人之路，那很有些近乎文远的。在他叙述了郭小川的一生经历之后，还指出：“文远似不如他颠簸，起落的幅度或不如他，但小川之所以为小川，在于他坚持‘诗言志’，既不‘婉约’，也非‘花间’，甚至连‘信天游’也不是，文学的成就定调是极重要的一关。”

平时，一接触到这个问题，惦斐总是一再叮嘱，在“言志”中，希望能成为“大江派”，也只能成为“大江派”。当然，“‘杨柳岸’、‘大江东去’，同为千古绝唱，从‘言志’看，都无悖于自己的初衷”。在这一方面，假如能作历史的反思，我实在有愧于他的希望，也有负于广大读者和其他诗友对我的期许。问题便出在他常常提到的“定调”上。

现在回忆起来，30年代与罗焚他们一起学诗时，便有一种虚无与自我的倾向，认为在那种“邻家怕听妻儿哭，断尽人肠是此声”的社会里，学会避世，能活得出来也就不错了，小技雕虫，是实实在在无“志”可“言”的。以后，由“太守”而“员外”，虽无装点门面的念头，却又产生了一种“繁华不为少年留”的远古幽思。清风明月，每有接触，率意为之，也没有铸成什么“定调”的心态。

当然也不是说在创作实践中没有自己的打算。如对怎样接通传统与现代？怎样接通此岸和彼岸？怎样接通直白与朦胧？还是做过一番思考和探索的。但有的亦往往被人视作“怪”诗。由于理论问题没有解决，好心肠的朋友，每每担心“这样写下去行吗”？行！我倒从反面把调子定下来了。

孟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难道我们就不可从凝聚了全民族的具有人民性和民主性的文化传统中去“推陈出新”，使当代诗歌具有更多的文化味，让新文化的建设更加具体化和规范化。“既要创造高档次的‘阳春白雪’，也要创造普及性的‘下里巴人’”，让我们的作品更具有它的连续性和广泛性。宁肯让别人不发表我一首诗，也乐于在剩下的这点点时间内，为民族传统文化按其实践效果发挥一点“余热”。

这苦衷我没有告诉过惦斐，为它作序的《乡情集》，也已在出版社搁置四年了，至今尚无消息。惦斐去年来重庆时还提到过此书，说出版后，一定要给他两本留作纪念。现在看，这本书算是报废了，即或出版，惦斐也永远见不到它了，真算一大憾事。

苟不是某氏门中人，一旦离休，便沉溺于“世态炎凉”的意识形态之中。可见交换观念在目前人际关系里是万万忽视不得的。好在这篇序文经杨甦先生审定，在《红岩》发表后，已收进他的《电影的锣鼓》一书，总算打了一个“响片”。今后，如国家不允“自费”出版，倘因他这篇序文而得以“存目”，也应该是死去的朋友为活着的朋友结下了一大善缘。而我呢？则总当设法把它印出来，以抹去长期留在我心灵上的一种歉疚。

但就诗，就诗言志而言，正如惦斐说的：“诗人已垂垂老矣！时间留给他的诗生活，将是另一种自我。”而这种自我开拓过程中的意境追求，以及现实道路中的如此种种，谁还能在尚书庭

院，巴子城楼，为之评说它的偏颇与不足呢？

齿发虽衰而风力犹在，责我最深者，无过于乡中一些应该受到保护而没有获得保护的文化遗迹的遭遇。

除陈独秀那间“小屋”之外，对江津城内那只剩下一个奎星楼残而且破的文庙，对那被改作粮仓主宰鬼域的城隍爷爷的衙门，在恽斐看来，“在政治上尽管都是封建文化的殿堂，而作为建筑艺术，却未始不是劳动人民的骄傲”。“文远是个诗人，在由他主政的地方，文化遗迹的遭遇尚且如此。其实是不应该的，而这不应该之中，文远恐亦不能辞其咎。”所论极当。

其实又何止“孔庙”和城隍爷爷的办事衙门呢？尚书庭院不是已经早被毁掉，不仅森林砍伐殆尽，连剩下的几堆顽石，似乎也有朝不保夕的势头。有名的聚奎书院，张慧光的《鹤唳声声》，杨大矛的《前有王县长，后有凌县长》两文，只说了其中山林一事。“文翁石”和其它一些当代名人如陈独秀、于右任、欧阳渐等人的题刻，不都一律视同反动，凿而废之了么？

记得恽斐在为《乡情集》写好序文的第二天，便东渡日本。在长崎参观了当地华侨为建成孔庙90周年而举办的中国文物展览，眼看孔子作为教育家和思想家在那里受到尊重，是颇有感慨的。回国后，还专门为此以“注”的形式，写了好几百字的一条记事，附在序文之后，重申他的观点。但他对我的指责，并非完全是因为“至圣先师”和“城隍爷爷”的本身，而是把“文庙”和“城隍庙”作为一种文物，一种文化传统为出发点的。

以此，我不仅曾经在和恽斐讨论这个问题时，表示过忏悔，并愿就此机缘，向我曾经为他们服过务的140万人民表示歉意。如果说还可以做些什么补救工作的话，我当乐意为之。历史就是历史，发现真理的每一个热点，这本身便也有它们各自的历史延

伸。

惦斐不但行文特殊，思想性强，政治上的敏感也是惊人的。前面提到的陈独秀曾经住过的那间小屋，地处江津西门外园艺场的柑桔丛中，抗战时期，原系江津望族邓某为避日机轰炸而筑的一座小型别墅。因系临时性的，所以，也比较简陋。

但在1979年，当我陪惦斐第一次回江津，访问这里时，沉于乐者洽于忧，便给他留下极深的印象，“在此大江之滨，柑桔丛中，那不就是陈独秀当年落荒的小屋么？他后来竟至堕入阴阳五行家的末路，那小屋，那通向小屋的石径，那连白色的小屋和金黄的桔子一起倒映在枯水中的影子，其实也就是中国革命史中令人触目惊心的画卷。”

后来，这种思想，这种感慨，惦斐都把它一一写进了《诗的融入》一文之中。他在1986年1月8日的一封来信中，还提到这间小屋：

“我现在不能去大地方，如成都、重庆，去了和不去一样有人找。我倒想起江津陈独秀旧居，可否稍事修葺，装一个土暖气，则冬下亦可去。夏日有何地方？你最了解。如此为江津在外的学人经营一个可资长期运用而又颇有点意义的住处。我的《电影美学》最后定稿，便想去那儿完成。这对小屋，亦是件有意义的事情。定名为‘江津书屋’亦佳。朴素、干净、少人工痕迹，贵自然风貌。亦不设沙发等现代家具，以竹为上，修葺费用以不超过500元为最好。如你赞同，可与某某言之。”

我把这封信中的上述一节复印并附小札转给某某后，给惦斐

回了信，他在当年2月15日的复信中还写道：“来信早已收到，小屋一事烦你操劳，但我估计我去的可能性极小。”

这些都足见他为邑中在外学人用心之深，为乡中文化谋事之劳，能不令人感佩。但这小屋的命运如何？俨如泥牛入海，一直没有消息。

死者已矣，生者权重；爱之适足以害之，现在反过来想，倒觉得我们这辈人的愚蠢了。

有一位作编辑的朋友说得对：追悼专刊之议（我曾向该报建过议），怕难实现了，加以经费困难，本刊已面临末日，况钟老辞世数月（也仅仅是数月），除城西旧友，其它衮衮诸公，恐怕连读钟老遗著的兴趣都索然了。——当然，他们也未必有此雅兴。

盖璞蕴于山，凡人难识其为美玉，待琢成精品，哗赞无价者，众矣！夥矣！而琢玉之人，他的艺术构思，他的思想力量，精神力量，知识力量和人格力量，则未必还为那些哗赞者所哗赞。

此公自谓言虽直而意颇偏。我则以为他当了20年的编辑，若痴、若癫、若狂、若狷，偏偏连时人已经习以为常的“人走茶凉”的处世哲学，都“懂不起”了么？何况，钟惦斐先生是死了，而不是“走”了，其它，还有什么可说的？

当然，这也有可能是怪错人了，是不是要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辩证关系弄通，还有一个认识历程有关，否则为什么在改革开放后的百废俱兴，百业并举之中，唯独他曾经主编并发表过惦斐好几篇文章的双月刊奉令停刊后，连一张一月一期的四开小报也都办不下去了呢？这能说是“钱”的问题？见仁见智，自然不必苟同，真与伪，美与丑，善与恶我们还是从钟惦斐其人、其

文、其事中去找寻各自的答案吧！

从文化到文物，从文物到文人，惦斐还常常从诗格、文格、人格诸方面去追踪，去思考。江津建县1500年来，人才辈出，古人自不必说，有时连谈起母校当年一些有作为的老师，也都眉飞色舞，引为骄傲的。因而，惦斐对江津中学，对江津中学同一年代的“师生员工”，特别好感，也特别关心，每有所闻，每有所思，必专函相告，冀有所谋。

例如就在惦斐去年2月15日那封信内的“又又又及”中，便曾经写到：“江津中学校友会征求校歌，代写了一首，但有几个字不满意，三个‘有’字，有点浪费，如作形容词用，当更好。‘峰峦’亦不尽妥。‘勤学’作‘发奋’如何？望更思之。作为我们的合作。歌词定后，我当在北京请第一流作曲家写谱。”

惦斐在以后的另一信中，还再次谈到这件事情：“校歌中，你的‘经济’一词改得很好，但我以为不提碧柳（吴芳吉）为宜。从江津看，尤其从中学看，他是一个可资纪念的人物，但从全国、从时代看，恐仍不足道。”

这校歌也和有关那间“小屋”的信一样复印邮给同一位受信者，请他转致江津中学，也仍和“小屋”一样，一点反馈的信息也没有。而这首几经修改后的《校歌》，我却再也找不着了，只有他手写的那张初稿，还夹在他给我的另一信中，录如下。

《江津中学校歌》

黄河汹涌长江娇，

长江为我亦躬腰。

育才人，重节操，

有文有墨有宝刀。

功旷代，领风骚，
峰峦更比鼎山高。
年少须努力，
勤学在今朝！

并在三个“有”字，“峰峦”和“勤学”的右侧，用红铅笔各划上一竖，意在提醒我为之“再思”的符号。记得是我把“经济文章更宝刀”以取代初稿上的第二句，以“思潮”易“峰峦”，把最后两句改成：“新蒲池碧柳，发奋在今朝”，而引起惦斐上述一番议论的。

去年10月和12月的两次见面，都忘了问惦斐这个歌的下落。不知他最后是怎么定的？是否请人写了谱？这个歌词现在何处？也就概不知情了。

从这一件小事情上，也可以观察到惦斐对同窗之谊之切，原也是从他的爱校之笃那种固有的素质所派生的。这一层次，也可以从他对江津中学80周年校庆的会前筹备和会后的种种建议中得之。特别是惦斐在校庆大会上的那篇演说，文如其人，真是内正其心，外正其容，受到校友们的“哗赞”。甚盼学校当局，能把他演说后又书赠母校的这份文稿保存下来，留个纪念吧！我可以作证，这篇文章整整耗费了他一个晚上的功夫，绝非应酬之作。

作为蜀人，作为一位影评家的激情，还反映在惦斐对重庆市和万县地区电影评论事业的关注上。现只节录他的两封信，用以说明他在这方面的张罗、临凝结而能断，也就毋须再由我来说三道四了。

“前几天万县文化局来了两位同志，要我10月3日参加万

县地区影评学会成立会。这显然是他们从文化局的刘茂芳处知道我28日在江津，我们拟订的日程是：

9月25日由北京飞重庆

26日我们（指我夫妇俩）同去江津

29日离江津返重庆上船

30日去忠县参观石堡寨

10月1日到万县

4日去白帝城

5日去小三峡

6日由巫山去宜昌参观葛洲坝

7日由宜昌飞回北京

和我同行的有子芳。匆匆聊报行踪，行前当另电告”。

发信时间为1986年9月8日。他从宜昌回北京后，又于11月28日邮来一函。

“我与子芳将于12月1日赴重庆，参加影评学会成立会。4日乘火车去柳州，参加全国影评学会年会。真正在重庆的时间只有两天，除参加会外，只一天半。食宿皆由市电影公司包干，你就什么也不必管了。”

这也是我所收到的他的最后一封信了。

今年5月，我应约偕碧琴去北京出席中华诗词学会的成立大会，原拟一同去北影，颇思有慰于子芳的。然恐翻红坠素，悲犹未已，何忍又置之于故园西望，百感俱来之中。所以只好在《西苑怀人》中，为她唱了我揪心的一曲：

楼台处处觅来真，心血常和老泪倾。

犹记灯城留片语，最消魂处赋消魂。

死者长已矣！临风慷慨，此心唯有老天知耳！

以班序论，我比惦斐略早，所以他常以高年级同学呼我。以生态论，他终年67岁，我今年已72，也较他痴长5岁，这篇文章原该由他来为我写的。看来马克思也是一位鞭打快牛的人。前些年有人把“一头大牯牛从废井中跳出来了”以形容乡中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而他却在经济形势大好中“跳了出去”。江山犹是，昔人已非，能不令人痛悼！但愿他也象陈老总那样，集旧部于泉下，把他的电影锣鼓敲得更响！更响！

1988年4月于重庆

有关建国教育社和新群文化图书 公司的一段回忆

吴 秋 帆

1945年夏天，我和朱明初遵照党的指示，决定去川北巴中一带扎根农村，进行革命活动。正当准备成行，《新华日报》编辑部一位同志忽来告诉我们：中原解放区很需干部，希望我们去那里。这当然是一喜讯，也是我们向往的地方。我们以喜悦心情，正积极筹备中，8月，传来日本宣布投降的特大喜讯，举国欢腾。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在这一大好形势下，杜桴生从化龙桥新华日报社来到市区，通知我说，不用再去中原解放区了。为了广泛开展和平民主运动，大后方更加需要干部。为此，我们便留下来，放弃了去中原解放区的打算。

“建国教育社”的成立

秋天，《新华日报》的杜桴生、洪沛然，根据党中央的要求考虑到当前形势，决定在重庆建立一个群众团体，定名“建国教育社”。通过这一组织，把重庆和川东、川北一带的部分中、小学教师中的进步力量团结起来。又取得了李筱亭的同意，由他来担任该社负责人。为了迅速落实这项工作，杜桴生特地邀约黄友凡和我去新华日报社，由黄友凡执笔，三人一起边商量边拟稿，整整花了一天的时间，写好了《建国教育社章程》（草稿）。